



中国周边外交丛书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Series

中俄战略协作 与欧亚地区秩序的演进

顾炜○著

THE CHIN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ORDER
IN EURASI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周边外交丛书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Series

中俄战略协作 与欧亚地区秩序的演进

顾炜○著

THE CHIN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ORDER
IN EURASI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俄战略协作与欧亚地区秩序的演进 / 顾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 - 7 - 5203 - 3158 - 6

I. ①中… II. ①顾… III. ①国际合作—研究—中国、
俄罗斯②国际关系史—亚洲、欧洲 IV. ①D822.351.2
②D830.9③D8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417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周边外交的“痛”与“通”

李开盛

《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有言：“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由来。众所周知，周边外交对中国极其重要，但有几个“痛点”始终横亘其中，如与日本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岛礁主权争端，与印度的陆地边界争端，朝核问题的困扰，还有美国军舰在东亚的“搅局”等。上述中医理论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些“痛点”，关键还是在于“通”，即不只是针对具体的问题制定具体的办法，更要针对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症结，打通与周边关系的“脉络”，从而做到“通则不痛”。

众所周知，中国与周边关系“脉络”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体现为：第一，主体多，差异大。与中国直接接壤的陆地邻国就有14个，隔海相望的还有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东南亚马来群岛上的国家，虽不接壤与中国距离接近的国家如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也属于周边范畴。这些国家民族、宗教均不相同，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各异，要一起相处本非易事。另外，已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象的美国虽非亚洲国家，但在中国周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根深蒂固，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周边关系中的最大变量。第二，问题多，办法少。涉华的政治安全方面的问题大致有四类，其一是领土争端，其二是与地区大国（如日、印）间的复杂地缘政治关系，其三是全球性权力变迁背景下中美在东亚的竞争，其四是一些虽与中国无直接关系但对中国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地区热点（如朝核问题、阿富

汗战争与克什米尔冲突等)。所谓办法少,主要因为中国周边可能是世界上诸地区中最为碎片化、欠制度化的一个区域。虽不乏各种地区组织与论坛,但在政治安全领域对中国有效力、起作用的少,出了问题往往还是得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而双边关系往往机制化程度低,受对方国家内政因素影响很大。一旦某国政府变更,中国外交努力就可能付诸东流。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各种具体的对策必不可少。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与周边关系中的“痛点”,关键还是要做到以下三“通”,才能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窘境。这三“通”是:

第一是利益要通。

政治安全方面的利益,往往带有零和的性质。如中国与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由于领土在近代民族建构过程中的特殊性,还常常成为东亚诸国民族主义寄托的对象,导致领土争端更加对立、难解。还有中美、中日之间的权力竞争,也往往被理解为“东升西降”的跷跷板游戏。但历史给中国提出来的挑战就是:零和性的问题,不能、不应也无法再通过零和式的手段解决。在与小国的主权争端中,把一个岛礁夺回来容易,但由此在地缘政治博弈与中国整体外交方面造成的短期损失与长期后果都会特别巨大。而当代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更难想象通过战争的手段去决定胜负。因此,面向未来的根本之道,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挑战就是要把“不通”的利益拉“通”。在这方面,中国事实上一直在进行各种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尝试。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潜在理念就是要把不通的政治安全利益变为相通的经济利益。如果未来能够实现争议领土的主权共享或是通过谈判达成公平的解决,则是直接把不通的政治安全利益变为相通的政治安全利益。对于中美争端,习近平主席也提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部分的总标题,而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就是要建立利益共同体。因此,利益相通的大方向对中国来说已不是问题。目前的问题是美国、一些相关国家反倒越来越不相信这一点,仍然在以传统的零和政治思维看待中国崛起。当然,中国在主权与权力共享方面如何实现利益相通,也需要有更加具体的方案,否

则也难服人。

第二是规则要通。

这里所指的规则，是指包括有关社会运行的规范与程序，背后往往有着某种价值、理念的支持。国家之间打交道，利益是根本，但不是全部。国家本身作为一定规则的产物，规则自然也是其政策目标考虑的一部分，甚至有时是很重要的内容。例如，美国把维护它的政治价值与生活方式看得比一般安全利益还重要，而中国也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核心利益。所以，国家间的合作与斗争，也常常与规则有关。相关的规则包括国内规则、国际规则两部分，分别涉及不同国家对于国家发展以及国际社会运行的看法。当前，中国与一些国家间的矛盾就与政治制度的不同有关，至少是政治制度方面的不同加剧了彼此间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近些年间还呈日益激化之势。对此，中国模式与以西方为代表的政治道路之间必须要找到结合点，这方面并非不可努力。例如，双方都坚持民主、平等、法治的价值，只是在实现方式上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双方能够从彼此间的共同点而不是差异点看问题，可能冲突就会少很多。实在是认识不可调和的时候，如果双方都能坚守互不输出、互不干涉的底线，也能做到和平共处。在国际规则方面更加复杂，因为它不像国内规则那样可以在国界后面相互分开，它是必须一体化的，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处一个国际社会，必须同享一个国际规则。更有挑战性的是，现在很难在国际规则方面明确界定谁是现状国家，谁是挑战者。例如，中国经常被西方认为是挑战现有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但当前的事实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而不是中国在破坏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面对国际规则争议，一方面是要尽可能扩大有关规则内容的共识，另一方面是相关各方要达成有关规则变化的规则。考虑国际社会从根本上说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建立有关规则变化的规则至关重要。正是由于没有这样的共识，历史上新老大国的权力更替才会通过战争来进行，现实中各国才会各执一词、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国际规则。要在国际社会中立关于规则变化的规则，关键是国际社会的法治化程度要有更大的提高，各国也要更多的国际法治意识，而不是动辄诉诸实力、权力甚至是武力。作为事实上的国际社会的“班长”，美国在这方面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作为潜在的“班长”候选人，中国也有义务更要有紧迫感，推动

建立有关规则变化的规则，这不但于整个国际社会有利，对希望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也是有利的。

第三是交流要通。

如果国家间利益不同、所奉行的国内国际规则有别，那么就必须要通畅的交流管道，才能促使各种差异不至于上升成矛盾，或是矛盾不至于激化成冲突与战争。要实现这种交流，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保持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通过交流促进理解，促进利益与规则的趋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长期与外部隔绝，不但先后与美苏交恶，与许多周边国家也相互对立，国际环境空前险恶，结果国内也发展不起来。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中国实力迅速增强、与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权力结构斗争日益明显、与周边相关国家的主权争端更加突出，但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基本正常的大国关系、周边关系，这与坚持对外开放、国际交流，促进了利益相互依赖以及政府、民众等层次相互间理解有着重要的关联。从技术层次看，所谓的交流要通，就是在具体的外交工作中，中国要保持并不断拓展与相关国家的积极沟通。在武力代价巨大、国际法律手段又不充分的情况下，矛盾只能通过不断接触、谈判的方式去化解。那种双边关系一出现问题就切断政治往来、限制经贸关系的手段在特定情况下有其价值与必要性，但总的来说不宜多用，更不能滥用。如果以更高的标准衡量，所谓交流要通还要求：其一，要有更高水平的交流能力。我们现在提倡讲中国故事，提中国方案，但不能讲的故事别人听不懂、不爱听，或是提的方案不合当地的需求，受到政治、舆论方面的反弹。其二，中国与相关国家建立更多、更有效的双边和多边沟通机制。如果能够把交流通过机制化的方式规定下来，而不只是依赖于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国家间交往就可能更少受具体的情势与问题影响，从根本上保持一种畅通的状态。可以说，在上述方面，中国还任重道远。

以上三“通”，实际上可以应用于整个中国外交，但笔者以为周边才是重中之重。这不但是因为周边十分重要，还因为周边是中国推行上述三“通”的最佳试验田。中国与周边地理相近、文化相似，更有利于做到利益、规则与交流相通。随着三“通”的逐步推进，前面所提

到的那些“痛点”才有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解决背景，找到新的路径，甚至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化于无形。党的十九大正式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报告，这不是宣传口号，而是中国外交要超脱传统的国际政治旧秩序旧思维、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而打通与周边关系的“脉络”，解决“沉疴”，则是走向这一宏大目标的第一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提出问题与研究意义	(2)
第二节 基本概念与研究现状	(9)
第三节 主要思路与结构安排	(25)
第二章 理解欧亚地区秩序的演进	(30)
第一节 欧亚地区秩序的演进	(30)
第二节 地区秩序演进的理论阐释	(37)
第三节 解释欧亚地区秩序演进的互动视角	(48)
第三章 中俄战略协作的启动与欧亚地区秩序的 初期演进(1996—2000)	(55)
第一节 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启动	(55)
第二节 欧亚地区秩序的多元选项	(66)
第三节 中俄合作与欧亚地区秩序演进的开启	(75)
本章小结	(85)
第四章 中俄战略协作的发展与欧亚地区秩序的 分域演进(2001—2010)	(88)
第一节 中俄战略协作的发展	(88)
第二节 欧亚地区安全秩序的演进	(95)
第三节 欧亚地区经济秩序的演进	(111)
本章小结	(125)

第五章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与共同塑造欧亚地区

新秩序(2011—2017)	(128)
----------------------	-------

第一节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的启动与发展	(128)
--------------------------	-------

第二节 中俄不同方案对欧亚地区秩序的影响	(143)
----------------------------	-------

第三节 构建欧亚伙伴关系与塑造欧亚新秩序	(153)
----------------------------	-------

本章小结	(165)
------------	-------

第六章 结论

第一节 中俄战略协作与欧亚地区秩序演进的逻辑	(167)
------------------------------	-------

第二节 理论总结:崛起国、主导国与地区秩序的演进	(173)
--------------------------------	-------

第三节 中国的地区战略与欧亚地区秩序的前景	(182)
-----------------------------	-------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导 论

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因两极体系的终结而呈现多元复杂的特点，但其中最稳定的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中俄两国自1996年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持续平稳健康发展；2001年，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了21世纪双边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2011年，中俄提升伙伴关系水平，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多领域合作由此进一步全面展开；2014年，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外交部网站在界定中俄总体关系时明确指出，“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① 外界甚至以“中俄联姻”来形容中俄关系。^② 从持续的时间来看，冷战后中俄友好关系的“待机时间”已经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苏友好同盟的维持时长；在国际关系史上，两个相邻大国能够持续如此之久的友好关系也是不多见的。更何况，两国非常明确地将双边关系定位为“不具有结盟性质”，^③ 因此，在“结伴而不结盟”的基础上，^④ 中俄友好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① 《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最近更新时间：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10/sbgx_679114/）。

② Robert Skidelsky, *The Sino-Russian Marriage*, *Project Syndicate*, 2015. 6. 18,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russia-marriage-by-robert-skidelsky-2015-06?barrier=accessreg>. John Grady, *Brookings Panel: Improved China-Russia Relationship is 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March 24, 2016, <https://news.usni.org/2016/03/24/brookings-panel-recent-china-russia-relationship-is-a-marriage-of-convenience>.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全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26/c_1119111908.htm）。

④ 王海运：《“结伴而不结盟”：中俄关系的现实选择》，《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5期。

同样珍贵的是欧亚地区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相对和平与稳定。与南斯拉夫解体造成了几场战争不同,苏联解体虽然同样遗留了诸多类似纳卡问题等尚待解决的矛盾,也给大国介入该地区释放出战略空间,但无论是地区内部矛盾还是大国在该地区的介入和竞争,都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①这显然成为欧亚地区各国进行国家转型时的大背景。与国家转型同时进行的是欧亚地区秩序的演进,这一相对和平的演进过程与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大国密切相关,而中俄关系的友好特别是战略协作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中俄关系的持续友好和欧亚地区秩序的和平演进都并非空手得来,这其中的经验值得借鉴。因此,本书将主要从地区的视角看待中俄关系,探讨中俄战略协作对欧亚地区秩序及其演进的影响,梳理和总结欧亚地区秩序演进的过程和经验,这将不仅丰富有关中俄关系实践和欧亚地区秩序演进的研究,也将为相关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案例。

第一节 提出问题与研究意义

本书的主要内容由中国战略协作和欧亚地区秩序这两个概念组成,探讨中俄战略协作对欧亚地区秩序演进的影响,是本书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在每一个概念中,都存在着许多有趣和值得研究的问题。本书对核心问题的研究能够为这些相关问题提供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的回答,并丰富本书的研究意义。

一 中俄战略协作的地区视角

就“中俄关系”这一大议题来说,冷战后的核心问题是中俄两国为何要开展战略协作并逐步建立起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为何这种高水平的友好关系得以持续稳定地发展。想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后一个问题,远比做出“中俄关系实现了持续友好”这一判断要困难得多,因为中俄关系本身具有复杂性。

第一,中俄两国拥有足够悠久的交往历史。在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

^① 作为地区内最剧烈和典型的俄格战争,也仅仅持续了5天时间。

中,中国与俄罗斯打交道的历史如果不是最长的,那也是最长的之一。无论是沙俄时代、苏联时期,还是冷战后独立的俄罗斯,有关中俄关系的丰富史料都能够支持学者们做出扎实的研究。^①虽然本书的内容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但历史却给了我们更具时间跨度的视野和比较的方法。例如,有关中俄关系的历史记忆,既有美好的,也有痛苦的,很难说历史决定了今天的友好。但我们却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例如通过比较中俄关系和中苏关系,有助于我们找到冷战后中俄保持长期友好的原因。但只有历史,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例如,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冷战后的中俄友好是因为两国共同面对着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但历史却告诉我们一个鲜明的反例:冷战时期的中苏两国都遭受美国的遏制政策,两国甚至还结成了战略同盟,但中苏同盟的持续时长远不及冷战后的中俄友好关系,很快走向了分裂,甚至在珍宝岛兵戎相见。这不仅显示了中俄关系的复杂性,也告诉我们需要拓宽思维从更多的角度寻找问题的答案。

第二,中俄关系是一种涵盖多领域的全面关系。中俄作为欧亚大陆上两个最大的国家,彼此又互为对方的最大邻国,历史和现实的交织造成中俄关系必然是多领域的。那么,冷战后中俄关系的持续友好,是否意味着在所有的领域中两国之间都不存在问题而进行着紧密合作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既不符合理论逻辑,也不符合经验现实。例如,“政热经冷”在冷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被用来形容中俄关系的特点,直到今天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扭转。所以,在不同领域,中俄关系的友好程度存在差别,战略协作开展的程度也并不相同,这就让我们在审视中俄关系时,在历史的纵向比较之外,需要增加横向比较的视角,考察中俄关系在不同领域中的异同表现。当然,若要提升对中俄关系的理解,横向比较还应该跳出中俄关系,或者以中国为中心,比较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同中俄关系的异同,或者将相邻两大

^① 例如,广东人民出版社就曾出版了一套共计3册的有关19世纪中俄关系的资料与文献的汇编集([俄]B. C. 米亚斯尼科夫主编:《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第1卷.1803—1807(上中下)》,徐昌翰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而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主编的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文件同样浩繁,整套共计12卷(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这些都对相关研究的开展颇有助益。

国之间的关系与中俄关系进行比较。^① 这种比较不仅有助于提高研究的理论水平,也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中俄关系特点的认识。

第三,中俄关系具有层次上的全面性特点。除了横向上涵盖多领域这一特点外,中俄关系的全面性还体现为涉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所有层次。按照层次分析法,^② 我们通常将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加以认识。在经典结构现实主义提出的个人、国家和体系三个层次之外,冷战后,我们又更多关注起介于国家和体系之间的次体系层次——地区,以及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次国家层次——如非政府组织、国家内部的地区或地方等。^③ 鉴于中俄两国的大国地位和其对整个世界的重要影响,我们通常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上研究和理解中俄关系。而在国家层次以下,在地方层次和以领导人为代表的个人层次上,中俄关系也得以持续发展。因此,中俄关系在纵向上涉及国际关系研究的所有层次,这使我们不禁要问另一个问题:中俄两国在冷战后的持续友好意味着双边关系在所有层次上都是友好的吗?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之前的问题一样,都是否定的。

中俄关系的上述复杂特点,意味着我们在时间与空间、纵向与横向、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等多个维度上认识和理解中俄关系时,不能简单草率地做出判断,而是需要综合性研究,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而,关于中俄关系和中俄战略协作的现有研究将过多的视角放在了双边和全球层次上。一方面,双边层次是研究两国关系的基础,中俄关系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全面性为研究双边关系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另一方面,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明确表明了中俄关系的战略高度,即在全球层次上两国面临着共同的体系环境和外部压力,需要开展宏观

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大国的稀缺,可作为比较案例的相邻两大国并不多,或许法国与德国的关系可以作为研究的参照对象。

② 有关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可参见如下两篇文章:J.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lan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77-92; 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欧洲》1998年第3期。

③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Bruce Russett and Harvey Starr, *World Politics: a Menu for Choice*, New York: W. H. Freeman, 1992, pp. 11-17。

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协作。

但地区层次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日渐重要，主要大国都不仅制定了自己的全球战略，也在相应地区提出了本国的地区战略。所以，从地区视角研究中俄战略协作，不仅是一个具有前景的研究增长点，也能够丰富我们对中俄战略协作的全面认识。且从现实实践来看，中俄两国都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地区合作发展方案，如欧亚经济联盟、大欧亚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如何认识这些方案，如何评估这些方案对中俄关系的影响，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中俄战略协作的全面性特点，已经意味着中俄两国在地区层次上开展了战略协作，这对欧亚地区秩序的稳定和演进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值得加以研究和总结。

二 欧亚地区秩序的多元视角

如何多角度地认识欧亚地区秩序，是本书试图探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其关键点，不在“地区秩序”这个概念上，而是在“欧亚”以及“欧亚地区”的概念上。放在“冷战后”这个相同的时间区间内，欧亚地区相较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来说，具有独特的发展特点和研究价值。

首先，“欧亚”这个概念是一个具有多指向和多含义的概念。^①“欧亚”既可以指广袤的欧亚大陆，也可以指中国外交部欧亚司涉及的国家所共同组成的地区，即位于亚洲与欧洲结合部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所在的地区。如果在后者的意义上使用“欧亚”这一词汇，那么在苏联解体之前，欧亚地区甚至可以说“并不存在”，它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苏联的组成部分，各个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国家内部各地方之间的关系，属于政治学，特别是国内政治的研究范畴，并不属于国际关系的研究内容。所以，欧亚地区的第一个特点是历史上的紧密联系。

其次，由“欧亚”概念的多义性所导致的是欧亚地区组成国家的多种变化。例如，最狭义的欧亚地区可以特指横跨欧亚两洲的俄罗斯这一大国，最广义的欧亚地区可以指整个欧亚大陆，而我们更经常使用的欧亚地区是一个地理范围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概念，即由苏联加盟共和国

^① 本书将在下一节详细阐述“欧亚”概念。

组成的地区。然而，在不同的语境中，这样一个经常使用的“欧亚地区”概念，其国家构成和地理范围也依然存在各种变化。例如，中国显然最初并不是“欧亚地区”的成员，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逐渐介入并成为欧亚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和一些国家一起组建了冠以“欧亚”名称的地区合作机制。由此，不仅使欧亚地区的国家数目和地理范围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这也成为欧亚地区秩序演进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从冷战后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看，欧亚地区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可变性和可塑性。

最后，欧亚地区的特点是年轻性。尽管有紧密的历史联系做基础，但在国际关系意义上，不仅“欧亚地区”本身是年轻的、新出现的，而且地区内的各个国家也是年轻的新独立国家，部分国家在此前甚至没有独立建国的历史。更有甚者，“欧亚地区”这个词汇也相当年轻，国际关系学界对欧亚地区的研究显然也是起步不久，还有很多值得发掘的内容。^①由此，欧亚地区的“年轻”使得地区各国不仅需要重新适应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在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交往规则。这些规则又成为欧亚地区秩序建立和维持的基础，对规则的调整 and 改变也推动了地区秩序的演进。也因为年轻，大国在欧亚地区的互动能够对地区秩序的构建和演进产生影响，且构建和演进这两个过程几乎具有时间上的高度重合性，欧亚地区秩序也因此在冷战后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中。

欧亚地区的这些特点提升了有关其秩序演进问题的研究价值，因为很难在世界其他地区找到类似的案例。但它也与其他地区具有相似性和

① 俄罗斯学界对欧亚地区的研究，深受欧亚主义理论的影响，尽管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具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但对外交政策施加强有力的重要影响还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有关欧亚派作为俄罗斯外交理论的梳理和研究，可参见柳丰华《“梅普组合”的外交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3页）。在此期间，俄罗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直接使用“欧亚地区”这个概念，而是更多使用“独联体地区”。在使用其他语言的学界里，受文本翻译的影响，使用“欧亚地区”这个概念的时间也不长。例如，在中国使用最广的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net”中（搜索时间：2018年5月8日），以“欧亚地区”作为主题搜索文献，对全部1106条结果进行学科分类，属于“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学科的文献只有242条，其中的234条都是21世纪以来的文献；以“欧亚地区”作为关键词搜索文献，在全部424条结果中属于“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学科的文献为127条，其中只有3篇文献的发表时间在20世纪。这些情况从不同侧面显示了“欧亚地区”的年轻性，也反映了我们对欧亚地区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可比性,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其结果有助于推进理论研究的发展。而不同的理论框架也为我们认识欧亚地区秩序的演进提供了多元视角。

第一,我们在通常意义上认识的“欧亚地区”,可以被视作以俄罗斯为单一中心的地区复合体,^①也可以被看作以俄罗斯为主导国的地区等级体系。^②这种地区秩序与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曾经建立的朝贡体系,以及美国在美洲以门罗主义为原则和在东亚以多组双边同盟为基础建立的地区等级体系,^③既存在联系又相互区别。俄罗斯作为地区中心或主导国,如何维持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如何建立和运行地区等级体系,又如何应对来自其他大国的介入以维持于己有利的地区秩序,我们对欧亚地区秩序演进的研究可以从一个角度回答上述问题。

第二,我们研究中俄战略协作与欧亚地区秩序演进的关系,可以将欧亚地区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崛起国中国,另一部分是通常意义上以俄罗斯为主导国的范围较小的欧亚地区。由此,地区秩序的演进过程可以被视作崛起国如何介入某一地区并改变其地区秩序的过程。^④那么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介入俄罗斯主导的地区时并没有引发中俄的激烈竞争和地区秩序的混乱?也就是说,为什么俄罗斯“接受”了中国的介入?欧亚地区如何管控了大国之间的分歧和竞争,又如何实现了

① [英] 巴里·布赞、[丹] 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423页。

② 顾伟:《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以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为例》,《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

③ 有关地区等级体系的研究,可参见如下一些代表性文献:David A. Lake, “Regional Hierarchy: Authority and Loc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Globalising the Regional, Regionalising the Global (Feb., 2009), pp. 35–58; David C. Kang,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4, 2010, pp. 591–622; Zhang Feng, “How hierarchic was the historical East As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1, No. 1, 2014, pp. 1–22; Ahsan I. Butt, “Anarch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mining South America’s War-Prone Decade, 1932–4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3, July 2013, pp. 575–607;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尚会鹏:《“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

④ 顾伟:《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以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为例》,《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